

滕藤同志：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师长

○ 顾秉林（1970届工物）



顾秉林前校长看望滕藤学长（右）并亲切交谈

今天，来参加滕藤同志追思会，感到心情很沉重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滕藤同志离开真是太意外了！就在今年3月10日，我为筹备清华大学研究班创办50周年纪念活动去家中看望他时，他还兴致勃勃地与我畅谈了整整一个小时。不想那成为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我是1965年考入清华工程物理系的，滕藤同志是工物系的创始人之一，他曾担任工物系第一任党总支书记。虽然我入学时，他已不在系里工作，但他和何东昌等前辈为工物系奠定的重要基础，对工物系的发展、对我们的学习和成长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而更为直接的接触源于清华在“文革”中由何东昌和滕藤同志创办的四个研究班。那是1972年7月，杨振宁先生再次回国访问，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见时，杨先生向周总理提出希望“倡导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”的意见。周总理非常重视，指示有关部门“要认真实施”。当时正处在“文革”后期，何东昌同志被结合

进了学校领导班子，是分管学校教学、科研的校党委副书记。他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，并结合清华的情况，与滕藤同志商量，决定成立基础科学研究班，并由滕藤同志具体落实。

1973年初，滕藤同志组织工物系、工化系相关教师，分别开展了固体物理、激光、物质结构、有机催化等四个班的筹建，并要求四个研究班在寒假后开课。四个班的学员由1964、1965届毕业生留校的“新工人”中遴选，初定每班10人。考虑到固体物理班毕业后，要筹建成立新的固体物理教研组，因此人数可以适当增加几人。滕藤同志亲自参与了选拔工作，通过与全校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协商选拔，最后四个研究班总共录取43人。1973年3月，四个班开始上课。但好景不长，不久就因“反右倾回潮”运动受到影响而中断。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在大家的强烈建议下，于1978年重新恢复，其中固体物理班又补充了几位学员。

这四个班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，对后来清华理科的恢复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。以我所在的固体物理班为例，1999年我入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，2003年范守善、朱邦芬同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，2009年隋森芳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；此外陈皓明先后担任了清华物理系主任、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，朱邦芬也曾担任物理系主任、理学院院长，隋森芳和张秀芳分别担任过生物系主任和党委书记，瞿振元曾任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、中国

高教学会会长等……可以说，这个研究班在当年特殊的历史环境下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道路。所以，同学们都把滕藤同志称为我们人生路上的一位“贵人”。2003年，在研究班创办30周年时，滕藤同志到会讲话，并深情为我们题词：“深谋远虑，周总理指示加强基础研究；历经劫难，固物班不负厚望成果丰硕。”

现在回顾起这四个研究班的创建，有两点我感触最深。

第一点是研究班学科方向选择的远见卓识。今年3月我去拜访滕藤同志时曾请教他，当时怎么选定的这四个方向？滕藤同志告诉我，他是学化学的，所以化学学科他来选，而物理学他委托张礼教授来选。要知道，当时中国正处于“文革”内乱、学术上与国际几乎隔绝的形势下。就是在那样一个极端特殊、极其困难的环境条件下，滕藤同志仍然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有着非常敏锐的战略眼光和极强的判断力、洞察力。今天，时光过去了半个世纪，世界科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四个研究班的方向，仍然处于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。

第二点深切感受是创办研究班的政治勇气。当时清华还在迟群等人的把持下，全校在大搞阶级斗争，政治运动不断，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批判、斗争。在那样的情形下，落实周总理的指示、抓业务、办研究班，应当说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。滕藤同志不顾个人荣辱、敢于顶住压力，体现出很强的勇气、魄力与担当。

今年，恰逢这四个研究班建立50周年。受大家的委托，我前往滕藤同志家中去看望他，并希望他为我们的纪念活动讲几句话。由于年事已高，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影响，他已经很长时间闭门谢客。我们是疫情放开后，他见到的第一批客人。当时，滕藤同志精神还很好，但他对无法亲自出席纪念活动感到非常遗憾，在谈话中几次喃喃地说到“我无法到清华参加活动了”，体现出对清华的深厚感情。我请学校宣传部的同志到场录像，并剪辑了一段视频，在纪念会上播放，大家都深为感动。

现在，滕藤同志离开了我们。但他的崇高精神和亲切教诲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，努力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愿滕藤老师安息！



清华研究班创办40周年留影，前排中为滕藤同志（2013年）